

2307
第十二辑

廣元市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廣元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编



广元市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广元市委员会 编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广元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曾子益	赵立中	
副 主 任	解大德	周承瞻	
委 员	杨正贵	唐文远	李奇林
	徐守银	江必鹏	陶锦春
	梁秀瑛		

本 辑 编 辑

主 编	赵立中		
副 主 编	解大德	周承瞻	
编 辑	杨正贵	唐文远	李奇林
	梁秀瑛		

责任编辑	梁秀瑛
------	-----

目 录

解放初苍溪城关民主改革片断回忆	陈正福(1)
建国初期见闻二三事	王泉浦(12)
解放初期原广元专区第一个合作社的建立	王占均(16)
建国初期的剑阁私营工商业	王守义 王 和(19)
建国初期旺苍的剿匪斗争	黄立诗搜集整理(25)
活捉匪首贾应坤始末	李开林(36)
剑阁县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概述	王炎生 张元熙(44)
昭化县抗美援朝运动纪实	吴文培(51)
忆剑阁的抗美援朝运动	王汉章(58)
老战士谈抗美援朝	杨滋和集录(65)
建国初旺苍县粮食统购统销概略	熊慎文(74)
我参加小学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的回忆	潘正江(83)
我参与整风鸣放的回忆	黄世鳌(88)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饶叶娃(95)
我所经历的反右斗争	王培方(100)
反右时期的广元县红专农场	杨滋和(107)
时逢跃进年代 身经自然灾害	刘泽九(114)
忆原干河乡钢铁兵团的上马与下马	史怀万(122)
我所经历的大炼钢铁运动	李生辉(129)

大跃进时期大兵团作战亲历记..... 史怀万(142)

经济困难时期下放干部的生活回忆..... 赵乃仁(150)

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再回忆..... 姚福田(156)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的分配核算回忆..... 张文俊(164)

广元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始末..... 何庆超(175)

农村社教运动纪实..... 白胤福(187)

我经历的城镇机关四清运动..... 白胤福(194)

农业学大寨赶化林运动简述..... 催 键(199)

建国后我所经历过的文化宣传活动..... 梁永元(208)

忆川医种子队在青川..... 光 耀(222)

追忆李蕴璞先生..... 王峻峰(227)

夏力耘耕耘剑阁中学三十年..... 梁承彦(235)

我的文学活动纪实..... 杨荣生(245)

广元市楹联学会十年回忆..... 张敬朴(262)

广元县 1981 年抗洪救灾工作回忆 何庆超(268)

剑阁“9.16”特大洪灾亲历记..... 王振会(277)

解放初苍溪城关民主改革片断回忆

陈 正 福

一、废旧政权 建新政府

苍溪县城关地处嘉陵江岸，故今为陵江镇。1946年为城厢镇，辖二十二个保，纵横十余平方公里，风景秀丽，古柏参天，名胜古物、庙宇林立，唐杜甫，宋陆游有“八景”“十景”之称。明成化、正德和清康熙年间，始筑河堤，修复城墙，其形如舟，门楼额题东为“保合”、西为“阜安”、南为“昭德”、北为“承恩”，民国时改东为“中正”、西为“中山”、城中街巷十余条，置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民众自卫总队、县参议会；工、农、商、教四大法团；佛教支会、道教分会；仁、义、礼、智四堂袍哥组织；同善社、高丰道、一贯道、紫霞坛四个会道门，还有陶、罗、杨、李四大家族。无电力、无公路、无科技、无建设可言，是封建政权、神权、族权统治的地方。

1948年，向竹修（四川长寿人）任县长兼民众自卫总队队长，为了政治需要、统治者利益，加紧军事策划，把县境匪首、特务拼凑的“反共同盟军”、“巴山中美合作技术所”视为一体，组成阆（中）、苍（溪）、广（元）三县“联防指挥部”，自任主任。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拖上九龙山打游击，企图抗拒解放，遭到县人反对，更慑于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川的节节胜利，向的指挥失灵，阴谋败露，于1949年11月13日携眷深夜逃离。

全镇七百余户三千多人心急如焚，怕遭兵匪祸乱，城中地下党和各界进步人士及时商讨于1949年11月16日成立了“苍溪县紧急治安维持会”，公告全县、保卫治安，稳定人心。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北独立师第一团赴苍宣告和平解放。1950年元

月二日,成立了“苍溪县解放委员会”,随着南下干部赴苍,18日苍溪县人民政府成立,中共苍溪县委诞生,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城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县委、政府加强对城关工作的领导。于1950年12月派谭祖斌驻镇指导工作,在各界代表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将原城厢镇所辖二十二保的一至四保划分为城关街,五至十八保划分为城郊乡,隶属一区政府。城关四个保改为四个村,民主选举村长、农会主席。一保为东关村,村长张友益,农会主席黄天理;二保为正南村,村长唐全福兼农会主席;三保为正西村,村长张国友,农会主席何万兴;四保为西关村,村长董绍康,农会主席杨发唐,改甲为村民组,选组长一人,改保民众自卫分队为村武装自卫队。

4月城关街政府成立,委谭祖斌为街政府主席,李文斌为农会主席,文书张友益,武装队长周正明,通讯员(炊事员)王允年。四个村改为街人民政府,称村长为街长。

10月县委群运工作团团团长蔡宝山赴城关街政府检查工作,确定张友益为工作团成员驻街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主席谭祖斌兼农会主席,宋永清任文书,四个街政府改为街公所,称街长为主任,我被选为东关街公所主任,宋永清为农会主席,杨俊被选为西关街公所主任。始建妇女会,称妇女主任,整顿武装队称队长,下设二至三个小队,设文书管理财粮,公安员管治安。形成了以政权为核心,农会为基础的统一领导,设置机构为民政、财粮、生产、文化、公安、武装,从而废除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府。

二、废旧婚姻礼教 建新婚姻制度

苍城婚嫁,在抗战前基本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古“六礼”旧章行事。1933年,红军驻苍,1936年“新生活运动”才开始有自

由恋爱婚姻出现,但仍限于少数男女青年,多数仍牢固保持旧俗,还存在着许多的封建性的各式各样的婚姻礼教,造成家庭不和、社会不安等问题。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城关街政府于4月组织开展了《婚姻法》宣传月活动。由四个村挑选了男女贫苦知识青年百余人,组成四个宣传队(又叫秧歌队),经过学习培训,形成了一支青年宣传力量。每逢三、六、九赶场,上午秧歌队扛着红旗,敲起锣鼓,扭起秧歌,走进大街小巷向群众宣传,学唱《国歌》。在闹市场所首先秧歌队员扭起来,接着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十分鼓动人心,然后宣讲员站在板凳上宣讲《婚姻法》,围观者洗耳静听。晚上打上棒槌灯笼,拿上竹编话筒,登上东西城楼,向群众宣传。下午组织小组群众学习讨论《婚姻法》,联系社会家庭和本人实际谈认识,揭发批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从四德”、“一夫多妻”、“寡妇不改嫁,嫁后不守节”的封建礼教,包办买办婚姻、强婚、重婚、童养媳,造成家庭不和,四邻不安的事例不甚枚举。如东关王某,自幼随父开茶馆行赌,长大成人与谭氏结婚,连生二子,后在镇当差,看上一有夫之妻,长期同居,占为己有,谭氏劝说常遭毒打。一次两个十余岁的儿子跪地求饶也惨遭毒打,母子三人喊天叫地亦无可奈何,便携带二子离家出走,异县落业。而情妇之夫张某,1948年服役回家,听其儿子苦讲情由,义愤填膺,毒打其妻,持刀杀王(未遂),便带上儿子离苍避难,两个美好家庭惨遭破裂,王在运动中被判管制三年。又如1935年3月28日上午,红军渡江胜利,城中百姓集聚新街头迎接,不料国民党飞机轰炸当场炸死十三人,其中白氏丈夫年仅二十四岁,死后哺养三个孩子,过着艰辛生活,守孝三年,杨氏姐劝说“招夫养子”被族人长辈得知,当众咒骂不堪,羞得痛哭流涕,逼得走投无路,大年三十夜晚,吞鸦片而死,年仅二十七岁。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沿街跪地拜孝祈求四邻

照养,世人见知无不悲伤流泪。看到封建婚姻礼教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恶果,自觉宣传执行《婚姻法》的人越来越多。街政府严格按照《婚姻法》规定,禁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干涉婚姻自由行为;禁止重婚,家庭成员之间虐待和遗弃。凡男年满二十周岁,女满十八周岁,在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要求结婚的,亲自到街政府进行婚姻登记,领取结婚证书,即确定为夫妇关系,在废除旧的婚姻礼教,建立新的婚姻制度的同时,处理调解了许多家庭因婚姻带来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问题。从1950年到1952年的三年中,县城自由恋爱结婚上百对夫妇,不仅没有一户违犯法规,而且实行了新式结婚典礼。夫妻双方面向毛主席像行礼,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来宾、亲朋到场祝贺,既打破了常规,又减了宴席负担。

三、禁烟禁毒 倒馆毁具

鸦片毒害由来已久,清道光年间流入苍溪。民国初年县设禁烟查缉局。由于国事纷争,军阀混战,有令不止,田颂尧部驻苍溪强行百姓普种普吸鸦片,视为军费来源之命脉。县城周围一块块地上全部种了大烟,城内五百余家有烟馆四十五个,吸烟者占成人数的三分之一。红军驻苍铲烟苗,禁烟毒,严惩种烟、贩毒者。一些官绅、保团、把头贩毒者闻风而逃,四十多户贫苦人家吸烟瘾民登记戒绝。抗战之后,县成立戒烟委员会,设戒烟所,所长母孟谈主持,瘾民自费入所,只见送饭人碗上是饭菜,碗底藏烟泡子(俗称)明禁暗吸。1937年又在正南街(今嘉陵路西段)设吸烟管理所,令老烟馆主管理,将收缴鸦片交由“官膏店”黄正刚经营。1939年设烟科与警察局配合,分烟馆烟灯等级登记纳税,或为合法买卖鸦片,警佐罗希圣明里禁,暗里又吸又卖,烟毒愈禁愈盛。1946年剑(阁)平(武)师管区补二团二营驻苍城考棚(今公安局)与警察局同署,又称接兵部队,县下令乡镇设置盘查哨,严防偷运烟毒入

境出售。成为董营长座阵指挥，耿、罗、李三个连长轮流驻苍，成为武装贩运鸦片的专业队，一些党政军警要员，恶霸地主、袍哥大爷参与其中，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之，必有瘾民，腐败社会，把人变成鬼，把人的世界变成鬼的世界。一天夜晚，几个军官吸烟赌搏之后，到正南街刘家面馆吃豆花面，席上争执起来，罗连长在文明棍中抽出二尺长的尖刀朝董营长脑部猛刺，当场死亡。四邻惊呼，围观者说：“分脏不匀，死有余辜”。却害得刘家面馆几年无人上门，正南村张玉金为镇长武装贩烟，杀死在长岭山，年仅二十多岁，留下老母，妻离苍城。东关村九、十两个组三十二户，贩烟两家，烟馆十一个，吸毒瘾者二十一人。有的卖完田产房屋吸烟，落得破产，有的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禁烟“通令”发布后，县人民政府发布查封烟馆，铲除烟苗命令，城关街政府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街公所设禁烟所。县人民法院在县城人民广场公开审判了烟毒犯黄玉书等人，公安局逮捕了陶家驹、黄正刚等人。组织群众学习宣传禁烟禁毒的政策法令，认识烟毒的危害性，禁毒的必要性，检举揭发了一批烟毒犯，由各街公所集中审查，批判斗争，交出鸦片一百五十多两，烟灯一百多台，烟具数百件，视其烟犯表现上报批准，召开群众大会当众烧毁鸦片、烟灯、烟具，逮捕罚办了十一人，管制了七人，一百二十八个烟馆主保证不再贩卖烟毒，宣布了不予追究，众多瘾民自觉向政府登记，限期戒绝。由于惩办了烟毒犯，断绝烟毒来源，倒毁了烟馆烟灯，许多瘾民自觉禁戒，取得了禁烟禁毒的彻底胜利。

四、禁止赌搏 查封赌场

苍溪县城赌搏由来已久，对社会经济生活危害很大，人们莫不以赌搏之害而痛心疾首（《民国时的苍城赌搏》一文笔者已全述，刊

于《苍溪文史资料,第十二集》,省《文史资料集粹第六卷》本文不再赘)。

1950年5月,城关街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发布严惩赌博令,对庇护窝藏赌博案犯,同赌罪论处,对在非公共场所赌博,情节轻微者,或者公共场所所有类似赌博行为者处以十天以下拘留七日以下罚役或十万元(旧版人民币)罚金,对职业赌棍施以集中教育令其转业,从事劳动改造。这些法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众多赌博参与者受启发教育自觉不参与赌博活动。并对因赌博所造成的偷盗抢、打架杀人、离家出走、嫖娼卖淫、妻离子散的事实进行揭发批判,分清了是非,认识赌博的危害性。全城利用各种形式进行赌博行为的场所一百四十多处,由街组造册登记,分别处理。一是利用节日、庙会期间摆地摊、掷骰子、压红宝等场所一律禁止;二是一些家庭聚众打麻将、玩扑克、压单双等赌博场所责令自觉取消;三是对茶馆、旅店行业重点惩治。茶商业十四家就有十二家前茶馆后赌场,旅馆十一户就有八户日赌夜宿,分别惩处逮捕法办的有东关“武平”、正南“槐园”、西关“桃园”老板;四是对以赌为业的赌棍十人分别判处管制的二人,转入工商业从事正当职业八人。由于赌博场所的解散,赌棍的惩处,到1952年底检查时没有发现再有赌博行为。

五、惩治封建迷信 取缔封建会道门

苍溪县城封建迷信活动由来已久,打锣、杠神、走阴、择地、算命、卜挂、看像等封建迷信活动盛行。有四家祖传为业,加之寺庙神话传播,“同善社”、“高丰道”、“一贯道”、“紫霞坊”坐宫传教,“成仙成佛”欺骗群众,谋取钱财,参与者较多,特别是一些家中老年人,每月初一、十五吃斋饭,敬神灵,传授害后人,成为社会公害。

1950年3月22日,保改村政权建立月余,县城传来一股迷信

妖言，“东河（即宋江）出了个皇帝娘娘，要来西门水井里取皇冠、皇袍，到北京登基就位，当皇帝”。一些会道门头头或迷信者或明或暗地传播，弄得人们心神不定。县公安局早有所察，一区政府紧急部署，区大队从四个村选拔了四十名出身好、思想好的村民积极配合，守卫四门要道，检查过往行人，持有“通行证”者入城，否则拒之城外。一天上午从云峰方向来了一台花轿、数乘滑杆，拥戴着数百人，行到伏云桥巷口被我们拦住，令其来人由此到苍中校内操场集中用膳，统统住进了西侧两间大的楼板仓库，苍中校前后两道大门，均有岗哨守卫，对城郊区部分看闹热的群众取证后，各自回家，无证者暂关仓库，经两天两夜的守卫，公安局一个一个的审查，原来是运山乡同善社恩职“巴山中美技术合作所”特派员肖履臣及何地乡同善社善长、“巴山中美合作技术所”情报处长何仕彦等人有计划、有预谋策划的反革命“皇娘案”组织，蒙骗琳琅村不明真相的群众拥戴梁何氏当“皇帝娘娘”，企图颠覆新生政权。查实后，当场拘捕了首要分子八人，遣送回家农民数十人。这一反革命“皇娘案”被平息，苍城内外街头巷尾，茶馆酒店，三五成群自发起来，揭露批判封建迷信活动和反动会道门的罪行。

1950年8月17日西南军事委员会发出明令取缔封建会道门，巩固革命秩序的布告，在城四门张贴。城关街政府积极布署，一面召开各种会议，发动群众揭发封建迷信活动；一面组织力量配合公安部门调查摸清四个会道门的组织活动情况，分别召开道首、道徒自新会，启发受骗者现身说法，绝大部分人幡然大悟。

1951年1月，县人民法院在城人民舞台召开公审大会，对元坝同善社头子杨乾三、何仕彦、何仕新、何仕万、梁何氏等人，分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县城四个封建会道门中的两名“善长”、四名“坛主”、三名“道首”、一名“主讲”分别实行交群众管制，其中明管四人，暗管六人。从此停止了封建迷信活动，取缔了封建会道门。

六、清匪反霸 镇压反革命运动

解放后,被推翻的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潜伏下来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到处造谣,杀人放火,投毒抢劫,进行破坏活动。然而一个一个的被镇压下去了。

1950年4月城关街政府成立后,把减租退押和清匪反霸结合进行。苍城地主出租土地在农村,农村减退的实物、征集的粮食数目,通知城里,互相配合,积极追收。少数开明地主如数交纳,多数地主一拖再拖。4月初的一个赶场天,县上通知各村民在人民舞台(今东城市场)召开“公审大会”。这次公审大会是县城解放后的第一次,上午八时会场人山人海,县公安武警十余人押着一高一矮脚带镣手带铐,面如土色的两名罪犯站立台前,法官宣布“苍溪县公审大会”开始,随即口号齐鸣,四个武装卫士把矮者匪首(川北反共同盟军第二团团)长)龚云谷推在前面,法官宣读其率匪众袭击我第七区(岳东)人民政府,抢走枪支弹药、电话机、劫毁仓库粮食等罪恶,并宣布判处死刑,即拖到河坝当众枪决。高者系回水场袍哥大爷、烟毒犯、恶霸地主白在金,经揭发斗争后,押回监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枪决龚云谷,白在金赔杀场的典故。时隔不久又在西门戏台上(今西城市外)召开第二次公审大会,会场周围数千之众,公审了三川匪首杨厚忠、侯××(名字记不起)和城郊特务分子任富德等,三人被处极刑,在西门河坝执行枪决。这时任富德说:“家乡父老乡亲们,我对不起你们,我死罪有应得,请把我尸体运回老家,来世报答。”通过这两次公审大会,镇压了反动势力,地主老实起来了,多数对应减退数、公粮数交完了,对曾任团政、残害红军、苏维埃干部家属的两名大地主以及拒不交纳的也依法逮捕入狱。长了群众士气,灭了地主威风。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

革命条例》，给干部和群众以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会道门头子。这个《条例》公布正值春节，在城四门张贴，过往行人无不关心，有的在朗读，有的在静听，有的在发笑，有的苦脸愁容、千姿百态，各有所思。城关街政府部署，一面组织秧歌队春节街头宣传；一面筹备新年会议。县上统一组织全县旧乡保长人员集训班，一方面学习《条例》，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面劳动改造，撤县城墙，修建仓库（今城郊粮站）。区人民政府设登记站，集中审讯与乡保长等有关的知情人员，贯彻“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交待自己检举他人的有关问题。街政府在住地火神庙（今印刷厂）礼堂，召开贫民代表大会，会场十分严肃，门岗验证出入。总结上年工作，学习镇反《条例》，分组讨论。一分团团团长蔡宝山亲临会场指导，在听了我们发言后，他说，城关工作搞得不错，很有成绩，减租退押征粮追收比其他地方快，现在要集中时间镇压反革命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反革命是个啥玩艺，问得大家半歇答不上来，他又说反革命就是过去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封建会道门头子，这些家伙去年抢岳东、歧坪区政府，在三川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不镇压他们人民不得安宁，政权不得巩固。他又问城里有没有反革命呢？大家说有，他问有那些呀！有余光玠、陶友三……一连点了十多人的名字。他说这就对了，你们心中有数。要按政策来，一个一个搞清楚，要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要同公安部门结合，实行镇压与宽大结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要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人民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罪恶不十分严重又愿低头认罪的反革命分子给予宽大处理。要严肃认真，谨慎细致，注意调查和证据，不要弄来斗一阵子，打一顿子，搞个逼供就算了事，既不要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又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他的讲话，使大家明确了方向，心花怒放，热情高涨，指名道姓的揭发出不少事实。街

政府作了具体安排,各街公所积极行动起来投身镇反运动。

(一)发动群众传达会议精神,学习(条例),检举揭发,揭发出反革命分子及罪行,由主任、公安员收集起来,查证核实,层层上报。

(二)组织宣传“镇反”政策。每逢三、六、九赶场天,秧歌队上街在闹市区宣传群众,晚上城楼上话筒宣传,利用各家的门板,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三)加强县城治安管理,严防反革命分子抢劫、放火、投毒、破坏,动员工商业捐献长矛马刀,武装自卫队员在各街所辖四门交通要道、东西水井、河坝“沙窝子”饮水处站岗放哨,严格检查“通行证”,确保运动顺利进行。

通过上述工作,镇压反革命的声势越来越大,拥护党和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反革命和知情人员主动向政府坦白交待,检举揭发出余光玠等二十余人的罪恶事实,先后经领导机关审查核实,批准逮捕了十八人,四月的一天,一区政府在城东关帝庙河坝(今陵江镇宿舍)黄角树下搭起简易舞台,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公开审判余光玠、陶纯武等七人,八字村烈士王文德的母亲年逾六旬,拄着拐棍,上台痛哭流涕地控诉余、陶残害自己儿子时说:1933年6月,余光玠(县党部书记)、陶纯武(镇大队)把我儿子抓到县党部严刑拷打,用尽残暴刑具,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没有弄出任何事实,活活拉到西门外新街铁匠炉坝子杀害,还不准我收儿子的尸体,害得我家破人亡,孤苦零丁生活十八年。一气之下她举起拐棍向余、陶打去,一棒打到陶纯武头上。上千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县人民法院判处余光玠、陶纯武、余以福、刘金光等七人死刑,当众枪决。对于民众自卫总队三个中队长、二名警察巡官、四个保长、二名残害红军的团政等反革命分子,根据他们的不同罪行及其服罪程度,分别判处不同

期限的徒刑,同时释放了四人交地方政府教育改造。

根据“惩治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城关街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派一名干部,七名武装队员配合公安局有关人员押送被判罪犯四十八人到四川江油县劳动改造。5月上旬集中看管人员在公安局短期培训,每人发步枪一支、子弹十发、要求纪律严密,押送期间不跑一个,不死一个,不病一个,半月完成。经过三天培训后,我们集中到县人民政府大门内看守所前,四十八名罪犯由公安局领导主持训话,宣布纪律,将人员编为四个组,每组十二人,在罪犯中指定一名组长,两名持枪武装队员前后各站一名,,用小指粗的棕绳一个套着一个的手膀。在途经大街时,两旁群众有的在骂,有的拿起小石子在打,从临江渡河沿坡而上前往东岳庙(即二区政府所在地)。这时,元坝罪犯杨禹田由于长期不劳而食,加之满脚板在坡上就走不动,像拖死狗般到了东岳庙。次日出发交由区上处理。一连走了十天,而我们又苦又累,白天要持枪步行六十里小路,晚上要轮流站岗放哨二个小时,中午要走三四十里路才能吃饭。我们开始还能坚持,五天以后大家就疲劳不堪了,犯人一个连一个捆绑着走路又你拉我扯,无论大小便都得一起解。在每天晚上开训话会时,要每组的犯人自己汇报思想,绝大多数比较老实,个别犯人由犯人斗犯人,要求松绑,而后将个别人交给组长押在当中,取了绑绳,到达江油办理结交手续,完成了“三不”任务。在返回县城的五天途中,走到河西杨家坝的一颗大树下,有同志提议庆贺一下,便拿起枪朝天打了一排子,惊动了农民,报告了县上,我们回城受到表扬,而放枪者都受了违纪处分。

这次运动,给反革命势力以毁灭性打击,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加强和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及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建国初期见闻二、三事

王 泉 浦

胡跃邦爱护知识份子

1950年秋天,全面开展“清、反、退、减”四大运动的前夕,川北行署在南充召开司法行政会议,那时候我们法院人手很少,总共只有七个人,院长丁济沐还兼任武装大队长,并且他识字不多记不起笔记,组织派我代表剑阁县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由行署主任胡跃邦亲自主持,除了传达中央关于“清、反、退、减”四大运动的政策外,还具体结合本地情况进行讨论。最后胡主任还说:今年在使用知识份子上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抽调了几万名教师去参加征粮,使上百万学生停课失学,有的学校甚至关了门,为这件事邓小平书记批评我们挖肉补疮不要下一代人了,回来后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深思自己是做错了。你们回去给各县领导代个信,尚有未开学的学校要马上开学,无论中心工作有多忙也不准抽调教师。在四大运动中,对知识份子,只要不属罪大恶极的,就不能随便批斗,在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出身于封建家庭;社会关系较复杂,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牵连,我们要用知识份子政策去保护他们这批国家宝贵财富。

会议在南充县委大礼堂召开,第二天中午散会后,走到卫兵室门口,突然出来一个青年跪在胡主任面前,他忙叫警卫员拉起来,一问知道此人姓周,是本县人,在县政府工作,前几天他们乡下开展四大运动(南充属试点,搞的早些),他的父亲成为恶霸批斗后押送进城,他偷偷地去送了一次饭,被人揭发出来说他包庇同情反革命父亲,故暂时扣押在卫兵室写交待,他有些不服,故大胆拦路申